

習主席偉略擘畫藍圖 大灣區建設造福港人

香港社會都熟悉這樣一個說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這「三個親自」，不僅講出了最高領導人關心大灣區建設的事實，更表明了大灣區建設在最高領導人心中分量。這「三個親自」實際上也告訴我們，大灣區規劃綱要凝聚了最高領導人的心情感、遠見卓識和大局偉略，體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的高度重視，飽含了最高領導人對港人的關心和眷顧，強烈感召香港同胞，引領香港社會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大灣區建設。

吳良好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福建社團聯合會榮譽主席

記得去年5月，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副總理在深圳主持召開擴大開放工作座談會時特別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自此，這句話就在香港傳開、扎根。

「三個親自」講出習主席關心大灣區建設事實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自提出並主導推動作出的重大決策。2012年12月，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首次離京考察就來到廣東，明確提出希望廣東聯手港澳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之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列入「十三五」規劃綱要。2017年7月1日，習主席親自見證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習主席還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這件大事辦好。幾個月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寫入十九大報告。

習總書記高度重視並親自指導制定大灣區規劃綱要：要求科學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建立協調機制；要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框架內，發揮粵

港澳綜合優勢，創新體制機制，促進要素流通；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發展的政策措施，等等。習總書記的一系列指示，成為科學編制、組織實施大灣區規劃綱要的行動指南。

以大灣區建設為載體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推的國家戰略，眷顧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是其中的重點。把香港問題放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統籌謀劃，是習近平與鄧小平的共通點。鄧小平主政時期，中國的經濟狀況還相當落後，重點是發揮香港在改革開放中的特殊作用，幫助國家實現現代化。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強起來時代」，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習近平新時代的「一國兩制」方略呈現出新特點：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大灣區建設為重點，帶動香港發展，發揮香港優勢，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讓香港同胞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成果和榮光。習主席強調，「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香港、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習主席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

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指出，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港澳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並提出了四點殷切希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四個「更加積極主動」，就是香港在未來國家發展和改革開放大格局中可以發揮所長、大顯身手的地方，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台。

強烈感召港人投入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拓展了巨大的經濟腹地、發展機遇，為香港居民提供更廣闊的生活和發展空間，在香港社會受到普遍歡迎支持。習主席對港人一向眷顧有加，對大灣區建設予以特別重視，這是港人希望見到的，也強烈感召了香港同胞，引領香港社會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大灣區建設。



吳良好

粵港澳大灣區的「飛地」模式(上)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日前在香港舉行。50多頁的《規劃綱要》，提到要有序發展「飛地經濟」，這是「飛地」概念第一次被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筆者認為，香港要認清自身發展的條件限制，尋找具有前瞻性的發展模式。粵港澳大灣區的「飛地」模式，或許是一個新出口。

「飛地」模式破發展瓶頸

所謂「飛地」，指的是兩個地域上相互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透過打破原有行政區域的限制，以跨空間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進行區域經濟合作。「飛地經濟」模式有幾個特點：行政區不隸屬同一地區，經濟、人文、社會或環境等發展存在差異，彼此有優勢互補性。粵港澳大灣區涵蓋廣東省九個城市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雖然同屬一個國家，卻覆蓋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四個核心城市，制度上史無前例。要達成大灣區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這些經濟體之間必須按照自身優勢形成區域分工，透過確立和強化各經濟體的專業功能，達至產業優勢互補協作關係。不過，香港在參與大灣區建設時，最大的挑戰是

如何打破邊界效應。「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存在文化、制度、經濟、貨幣、法律體系及地理因素等差距。一些外部挑戰因素較容易消除，例如去年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相繼開通，「橋鐵組合」將大灣區重點城市串珠成鏈，引領彼此進入「一小時生活圈」。地理差距透過交通運輸基建縮小，但要解決植根於社會內部而產生的內部差異，就要花費更多功夫。譬如，經濟發展和行政管理。在粵港澳大灣區引入「飛地模式」，可以破除在灣區城市內影響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自由流動的制約和瓶頸。

「香港經驗+內地實踐」發展「飛地特區」

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曾設立各種特殊經濟區，作為落實不同政策的試點。隨着內地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功能區的發展模式也在不斷創新。筆者認為，未來可以在大灣區不同區域設立不同功能的「經濟飛地特區」，由香港和內地共同建設，但引入香港「飛地管理」政策，以香港自由貿易港的國際管理經驗，實行香港「飛地管理」政策，以「香港經驗+內地實踐」模式，在灣區「經濟飛地特區」實行具有前瞻性的融合政策。

香港和很多廣東省城市向來有協同發展合作。上世紀90年代，香港製造業北上到內地發展；香港回歸後，金融與專業服務業也打開了內地市場，資源共享和擴散有利於加深彼此交融。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經濟區發揮了粵港合作的良好示範作用。

這種具有離開本土在其他地區進行管轄的「飛地」模式，在澳門和珠海之間也曾成功實行。澳門面積只有32.9平方公里，毗鄰的珠海則有1,736.5平方公里。2009年，澳門獲中央批准，以租賃形式在珠海橫琴島上建設澳門大學新校區，面積達1.0926平方公里，是舊校區的20倍。新校園建在珠海的土地上，卻由澳門全權管理，成為澳門本土以外的「飛地」文教基地。

在大灣區建設下，「飛地」政策和管理可以以依託粵港澳過去的合作基礎，實現資源整合、利益共享，把香港優勢引入灣區「經濟飛地特區」，發揮區內發展「一加一大於二」的疊加效應，從而實現一體化經濟區域利益的最大化。這不僅僅對「飛地」提供延伸發展空間，對「飛地」帶來新經濟增長元素，也必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高效發展帶來新動力！

(未完，明日待續)



黃芷淵

香港須有大局意識 發揮大灣區協同效應

沈家榮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統籌謀劃的國家戰略，為粵港澳三地擘畫亮麗的發展藍圖，更希望粵港澳大灣區成功建設，為中國經濟社會升級轉型提供示範和經驗。香港在大灣區規劃綱要被賦以重任，顯示中央對香港寄予厚望，因此落實規劃綱要、推動三地合作，香港必須有大局意識，摒棄以我為先的狹隘心態，放下「被佔便宜」的擔憂，才能把握大灣區巨大的發展機遇，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

規劃綱要把香港放在核心的地位，雖然香港與澳門、廣州、深圳同列為大灣區四大核心之一，但是大灣區大多數重大合作平台、各類重大制度和產業創新合作，都可看到香港的身影。很明顯，中央依然希望香港發揮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優勢，大力發展國際領先的創新業，從而帶領大灣區實現互利共贏。

營造一體化的合作環境

規劃綱要出爐，引起香港社會各界熱議。大灣區

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兩種社會制度，要爭取區域整合協作，首先要突破這些制度阻礙，營造一體化的合作環境，這本應該是討論的焦點。但從近日香港媒體的反映來看，輿論主要集中在港人在大灣區的繳稅問題，以及兩地進一步融合，擔心內地人佔用香港的醫療資源，例如日前有大批內地人到香港打疫苗。對於大灣區合作，香港確有部分人抱懷疑心態，認為香港未享其利，利益先受損，這種負面心態和思維，若不妥善引導、及時消除誤解，不利推進大灣區合作。

事實上，任何合作要成功，前提一定要互利共贏，既要合作就要同心同德，既要共贏就要肝膽相照，發揮好天時地利人和的合作優勢，在謙讓謀劃中達成共識，在利弊切磋中找平衡。規劃綱要既然賦予香港非常重要的龍頭角色，香港也要有作為龍頭的胸襟和擔當；另一方面，規劃綱要為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包括公務員、國企、中小學教師等職位已向港人開放，港人在教育、住房、養老、交通等方面也可享受內地居

民的同等待遇。正如有特區政府官員指出，規劃綱要令香港經濟發展更多元，為港人提供多一個學業、就業或創業的機會，社會要設身處地思考，若港人在內地工作，享受內地福利，但就按香港稅率納稅，是否完全適合。

勿對利益斤斤計較

更需要看到的是，中央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視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由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這說明大灣區的規劃，中央思考更多的是通過統籌令資源合理分配，使整個區域利益最大化，從而為國家整體經濟轉型注入新活力，探索「中國式開放升級版」。大灣區是為整個國家大局服務，大灣區合作不僅要放棄龍頭之爭的狹隘心態，更不能對利益斤斤計較，只注重維護自己利益，不考慮別人的利益和感受。這一點，關乎大灣區合作的成敗，更關乎香港能把握大灣區機遇，特區政府和港人都必須充分認識。



沈家榮

戴耀廷煽動仿效「黃背心」其心可誅

穆家駿 中學老師

筆者最近閱讀一本來自法國社會心理學的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這一本超過一百多年的書，當中有幾個觀點正可用於分析現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比如書中說，「群眾在群體事件中沒有自我意識以及不接受討論」。「黃背心」運動因政府計劃加徵燃油稅引發，背後反映的是政府希望透過加稅打擊柴油車排放污染，進而實現更環保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後來即使政府妥協，並凍結徵收燃油稅的計劃，自稱抗議領袖的人士，就將訴求上升至要求總

統馬克龍下台、國會全面改選，根本不接受政府的妥協。在「黃背心」運動中，群眾的「無意識」不斷放大，即使與原本的目標不一樣了，但人們像被催眠一樣，只是條件反射般，每個周末走上街頭，發洩對政府的不滿。

在最近的示威中，更開始出現辱罵猶太人的行為，與運動開始時的反燃料稅、反馬克龍政府初衷完全不同，更滲入種族仇恨等的排除因素。這與《烏合之眾》一書中所講的「無意識」不謀而合，示威群眾中只要有部分激進分子混入其中，激進分子的情緒化

慾望，轉變成為其他訴求的示威活動，令示威活動無日無之。「黃背心」運動令原本已經低迷的法國經濟雪上加霜，去年經濟增長由前年的2.3%，進一步減少至只有1.5%。正當法國深受「黃背心」運動的拖累，違法「佔中」搞手戴耀廷居然揚言，香港之後發起「非法佔領」需要仿效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方式，每逢周末走出來衝擊，希望以持久的方式進行抗爭。戴耀廷煽動香港仿效法國「黃背心」運動，企圖借此搞亂香港，其心可誅。



穆家駿

優化「一帶一路」項目投融資路徑和管理架構



周穎 「一帶一路」總商會會員 德勤稅務合夥人 吳芙蓉 德勤「一帶一路」服務高級經理

巴基斯坦、印尼、越南、老撾、尼泊爾、柬埔寨等東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是眾多「一帶一路」項目投資的熱門目的地。香港有輻射上述區域的地域優勢，又有經貿、金融、物流、人才等專業優勢，借道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將實現內地與香港互利共贏，甚至與多方投資者共利多贏的局面。

案例：東南亞某國電力開發項目投資架構和管理優化

項目背景：某家以EPC工程總包為傳統主業的電力行業國企集團與當地合作夥伴組成的聯合體獲得了東南亞某國水電投資開發的30年特許經營項目，項目將以BOOT（建設-擁有-經營-轉讓）方式開展。

項目挑戰：相比該企業擅长的傳統EPC總包項目，該水電開發項目涉及30年特許經營，需要企業從融資、投資、建設、運營管理等領域全面參與，因此對企業的投融資、經營管理、風險管控等綜合管理能力都提出了較大挑戰。

從稅務管理角度講，在海外進行投資項目，由於項目所在國稅收徵管體系多種多樣、複雜多變，並且通常對外國投資者參與的投資和工程項目具有較為嚴格的稅收徵管制度，使得負責財稅評估和管理的人員面臨極大挑戰。

曾有中國國有企業背景的投資者，引發東道國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考慮，而最終導致投資失敗的先例，這也是該國企集團的風險之一。

解決方案：在前期調研評估階段，該企業在專業顧問協助下深入分析投資目標國的稅收政策、徵管機制、雙邊及多邊關貿協定網路、以及當地給予外國投資者可能適用的稅收優惠待遇。

通過在香港等地設立投融資平台和供應鏈管理中心，有效地優化了該項目的投融資路徑和管理架構，充分發揮了香港、新加坡等地作為東南亞地區的金融、物流、稅收、人才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對其投資項目的成本優化、資金回流、風險管控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項目落地實施和運營階段，該企業還與當地合作夥伴通力合作，一方面積極向當地相關政府部門落實稅收等方面優惠政策，取得相應批覆和相關法律檔；另一方面，企業也對日常稅務合規、關聯交易管理、中國境外所得稅抵免等方面管理予以了充分重視，隨時關注專案國及中國的稅收法規變化，在合規基礎上爭取了企業較優的稅後回報。

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投資和經營，一定要深入調研項目所在國法律、稅收等方面制度和規定，並在此基礎上結合企業自身特點，盡早採取必要的風險管控手段和優化措施，降低企業跨國經營的稅務風險，提高項目的稅後收益。借力香港等地的地域和專業優勢，可以優化投融資路徑和管理架構，減少風險。無論前期盡職調查還是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都可以借助專業機構的全球網絡和人才優勢，快速高質地完成。

(德勤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二，分享一篇實際案例為中心的文章，以期提供切實有益的

方嘉偉 小學教師 香港群策匯思成員

近日有傳陳茂波司長考慮向全港學生派發2,000元，根據2017/18年度數字，本港一共有約88萬名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學生，如人人派發2,000元的話，涉資約17億公帑。消息傳出後，我注意到網上的回應普遍不太正面，普遍來說，學生已經有家人供養，而有困難的家庭已獲政府福利，這筆錢最多錦上添花而已，更有網民反建議應該增加教學資源，作為小學教師，我也是這樣認為。

普羅大眾未必知道，一般學校是沒有教學助理編制的，只是學校拿不同經費「頭頭尾尾」的錢聘請的臨時工，而這班對教育滿腔熱血的年輕助理的資歷比不少常額教師更高，亦承擔了不少教師的責任，但是待遇和工作量卻是不成正比，大部分人的工資只有約一萬多元，連全港工資中位數也不到，而這群助理缺乏功能組別的投票權，一直未能得到教育界協會的支持和認可，故每次政府增加教育開支時，教學助理也是被遺忘的一群，一點資源也分不到。同一時間，筆者常常見到教員室和教學助理室總有一些兒童是沒有人接放學，要留下來直到較晚時段才有人接放學；而中學亦總有一些少年是欠缺家人照顧，放學到處流連，這些人家長普遍雙職，但剛好不符合資格申請政府資助的課後託管服務，這些學生除了需要人照顧，成長上亦需要一位師長關心。

根據2018年數據，現時香港的教學助理、支援老師、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人數約在1,000人以內，津貼他們的有關款項只是17億元的九牛一毛，其他款項更可用作兒童醫療券，針對性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家長尋求校本以外的言語治療、教育心理學、社工、醫生等醫療服務。因為現時校本服務大部分就算排期做評估已經要一年半載，錯過治療黃金期，而及早發現和作出治療，除了減輕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家長的壓力外，治療成效亦較為明顯和低成本，最終有助政府節省日後支出。

精準優化教育較人人派錢更好



青年議政

筆者最近閱讀一本來自法國社會心理學的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這一本超過一百多年的書，當中有幾個觀點正可用於分析現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比如書中說，「群眾在群體事件中沒有自我意識以及不接受討論」。「黃背心」運動因政府計劃加徵燃油稅引發，背後反映的是政府希望透過加稅打擊柴油車排放污染，進而實現更環保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後來即使政府妥協，並凍結徵收燃油稅的計劃，自稱抗議領袖的人士，就將訴求上升至要求總